

F E A R A N D H O P E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 ☆ ☆ 百世文库

恐惧与希望



五个家族
三个世代
在经历了人性最残酷
最暴虐的屠杀之后
纳粹大屠杀的经历
如何面对自己的创伤
如何重建心灵的自信
如何重建自己的自信
以恢复尊严与自信

「以」丹·巴旺 著
张嚶嚶 译

☐ 中文简体字版 © 1997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 本书中文简体字版版权由台湾大苹果股份有限公司代理

恐惧与希望

[以]丹·巴旺 著
张嚶嚶 译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呼和浩特市新城西街 20 号)

北京星月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 × 1168 1/32 印张: 14.5 字数: 320 千

1997 年 11 月第一版 1997 年 11 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 1 - 10000 册

ISBN7-204-03701-4/B·20

定价: 28.00 元

献给我的祖父母及父母

——我得到他们无比的关心与爱护

果园里的树木有美妙的枝叶和果实，但根茎突遭侵袭并开始坏死。我们于是在贴近树干但不受伤害波及之处种了一棵新苗，并且把它接枝到树皮上。当这棵小树苗扎根之后，它的根取代了毁坏的老根，而老树也因此得救，老树再度有自己的枝叶，树干，根……我们的家族在大屠杀事件之后，曾像一棵失根的树，但现在，当我们，祖母和祖父，我父母和我，围桌而坐，我觉得我们好比是维系家庭老干的新接枝。

作者识

本书里接受采访的人都以化名出现,而且地名也被隐瞒。受访者同意参与本书所引以为据的这项研究,而且同意在这种条件下出版本书。这项研究是由“德以基金会”(the German—Israeli Foundation)赞助。

前言

我成长于一种混着恐惧与希望的奇特气氛里,这也是我这一代许多人共有的经验。这种气氛承自我们的父母——在纳粹大屠杀中幸免于难的、逃亡的或自欧洲移民的犹太人。我们都必须在这两极之间走出我们的成长之路,一方面设法克服恐惧,一方面为我们自己的子女提供希望。本书设法探讨的,就是这股奇特的混合情怀。今天,我相信那股混合情怀当时似乎显得奇特,因为当时我们根本不知道自己确实置身何处:当时我们是否因为某件可怕的事曾经发生——或可能发生——而感到害怕呢?当时我们可以期待较美好的事吗?这两种情感曾经——而且也许至今仍然——深深地交织在我们的生活里,以致于我们几乎无法区分两者。我怀疑这种现象与伴着我们大家一起成长的、那种被连根拔起的感觉有关。我们并不真的“属于”新枝干,但是老枝干却已经骤然被截断。你可以阻止失根感或表现得“若”无其事。你也可以接纳并设法与之共存。我们是否已把这种失根的情怀延递给我们自己的子女?我们是否已成功地修通这种情怀,或至少已有所认知?这些问题就是本书的焦点。

在我成长期间,我很幸运地拥有祖父母以及一位舅舅和他的家庭。不过,我一直到多年后,在接受精神治疗而回想起自己的童年时,才知道自己多么幸运。当时突然出现在脑海的景象是,我们那个德语区的祖辈们定期齐聚在海法喀麦耳山上的一家咖啡馆玩牌时,他们所占用的小桌一般不会超过两张,顶多只是3张而已。我们那个地区的小孩子在成长期间,大都没有祖父母。他们在六七岁之前,就已没有祖父母,或叔伯阿姨,堂表兄弟姊妹。留在纳

粹德国的那些人,都在所谓的“犹太大屠杀”中被杀害。我父母亲那一代成长于一个没有大屠杀的世界,但是对我们而言却不可能有那种世界。是否因为有祖父母,才让我没有恐惧,让我不觉得失根?也许在某种程度上真是如此,但是我真的不知道,因为我没有另一种经验可以相比较。

在我大约一岁左右时,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我最早的记忆之一,大约在3岁左右,我在半夜里被拉下床,躲到我们在花园里所挖掘的一个避难处。我如今还闻得到我祖母的灰皮手提袋(后来我听说她总是把所有珠宝都装在这个提袋里面)的气味。她一定是把提袋拿得跟我的头差不多高。多年之后,灰色总会让我嗅到那股特殊的气味。听人家说,在意大利空袭海法港的炼油厂期间,我总是兴高采烈,而且是人人开心果。但是我只记得每听到远方的炸弹爆炸,我就紧抓着祖母的手。

由于父亲当时不在家(他是英国军队的一名医师,驻扎在埃及),因此我经常与祖父消磨时间。我尤其记得他的眼睛,眼神充满温暖与真诚。他虽然秃头(我现在也秃了),但是稍蓄八字胡,而且他还带着一根美妙的旧手杖,这根手杖如今仍存放在阁楼的某处。我们总会一起长时间散步,他边散步边说各种故事给我听,当然是用德语说。我的祖父母都不懂希伯来文。他们在我出生的前两年才来到海法,是我母亲回德国把他们带出来的。如果当初她没这么做,他们一定像他们同辈的许多人一样,留下来并惨遭同样的命运。我祖父是地道的德国爱国者。他曾打过第一次世界大战,而且认为没有理由离开家乡。因此,我是在美妙的德国文化——德国的语文、音乐、食物、衣着和家具(在1933年时,我父母仍然可以带着家具同行)中成长的。但是,我也记得我曾在英国广播公司的广播中听到了希特勒的声音,他用那种我家人非常喜爱的语言吼叫,家人全听得吓呆了。

我想我在那个年纪是无法完全理解的:当德国人是好还是坏

呢？是满怀希望还是充满恐惧呢？但是，我当时一定已稍微懂事，因为数年后我常听说，我总会在愤怒时刻（我的确偶尔会心生愤怒）对着我父母和我哥哥大吼：“你们全都是德国人，我是家中唯一的犹太人”（意思是，我是唯一在以色列出生的人）。然而，在我生命的那个阶段里，几乎整个社区都是这种犹太裔德国人。我父亲从战争中回来之后，我们家人在晚餐桌上都用三种语言交谈：我父母说德语（或不想让我们知道时就说英语），我哥哥和我则说希伯来语。

我还听说我总是独自一个人在我们那一层狭小的公寓里玩数个小时，那一栋公寓是德国进口的预铸铜屋。我常学着我母亲在晚上所做的那样，把房间布置成一个室内乐的演奏场所。我当时一定已经在她身上感受到对音乐的喜爱以及制造乐声的强烈欲望，那是她在一个已疯狂的世界中保持清醒的方式。到我家来演奏的人，有些是英国人。我家花园的隔壁就是一处英军营地。对我哥哥和我而言，这处营地一直都是恐惧之源，但是对我母亲而言，这一定让她有安全感。事实上，我父亲说服我母亲在1933年由德国移民至巴勒斯坦的理由，就是“这个地方毕竟是英国的管辖区”。然而，最后把我们赶出家门的，却是英国人，当时是他们在撤退之前的1947年11月29日至1948年5月15日期间，他们要设立一处集结所有兵力的安全地区。

我们被英国人迁移到德国（互济会）殖民区中一栋有大理石地板的石造大房子里。当时这个地区的居民大都是阿拉伯人，而且就在独立战争爆发之前，我们在那个相当有敌意的社区，是唯一装有电话的犹太家庭。我记得我们客厅的一景：我母亲端茶给英国士兵喝，这些兵都荷着布朗式轻机枪，在我家门外的大街上维持秩序；而在我父亲的诊所里，一组“哈佳那”（就是犹太人的自卫队，当时还是非法组织）则正在开秘密会议并打电话。

我还记得我父母之间的一次讨论：我母亲想要随英军离开。

她不信任没有英国人的中东。我父亲因为比较融入新兴的以色列社会,所以想留下来。我们也想留下来。这是一个可怕的回忆。只有在回想时,这事才有正面的意义,而且之所以有正面意义,也只是因为他们在我们面前公开谈论这些问题。如果他们曾试图向我们隐瞒他们的情感、疑虑及对立的意见,事情一定会变得很糟。这是当时许多有“以色列”形象的家庭中所发生的现象。但是,由于我当时还是个小女孩,因此,这种讨论只会让我更害怕:我们会留下来吗?我们会离开吗?置身于那些较“融入”、且全心相信整个现况的人之间,我们到底是谁?在这次讨论之后不久,我哥哥和我必须再度疏散,因为阿拉伯的狙击手正在射击我们的房子。不过,在几天之后,我们就得以重返家门。

在1948年的逾越节那一周,海法被解放了。我们可以感受到这次解放所付出的代价。当时有个名叫雅蜜拉的阿拉伯妇女在我家照顾我们并帮我母亲操持家务。由于我们当时没有拿到补给品,因此她总会带来糖和面粉。她很亲切,我们也都非常爱她。有一天,当哥哥和我不在时,她含着泪水来到我父母面前,说她的家人即将前往黎巴嫩,因为“他们已打了败仗”。我父亲设法劝她留下,说他会照顾她的家人并让他们在这个新兴的犹太国家里平安无事。但是,她无法自作决定,而她丈夫不想留下。当时她有6个孩子。他们最后可能就是在南黎巴嫩的难民营里落脚。数年之后,当我在服役期间被派往北部边境实行夜间巡逻时,我常想象她的某些孩子也许会设法回来从事破坏活动……。

我哥哥当时16岁,年纪太小而不能参加独立战争。不过,他仍然会把一些与战争有关的以色列故事或歌曲带回家来,而且他还参加童子军的青年运动,并在服役期间考虑前往某一处集体农场。他在这些事情上为我铺了路,因为我母亲一想到以色列文化中那些“尚武的倾向”,就恐惧多过希望。等到他去英国的剑桥攻读数学之后,她才安下心来。他后来成为一名经济学家。我则用

较认真的态度修习以色列的拓荒课程。我在16岁时离家,改用一个听起来像希伯来文的姓,并进入一所农业中学。卡度利农校在早期曾因培养以色列突击部队“帕马克”^①的领袖人才而颇具声望。我在生命的那个阶段所想要做的,就是摆脱我家那复杂的欧洲传统——一种我在当时的以色列架构中仍无法找出意义的传统。我只想变成一个“撒布拉”(就是土生土长的以色列人)。我父母早就明说他们不赞成我在谋得一技之长之前就进入集体农场,因此我以智取胜:我变成一个农夫。

那几年真是美妙的时光。我在一个大都是男孩子的青年社会中享受自力更生的自由。我们几乎在每个空闲的周末都去远足,而且在徒步中认识了加利利地区的每一个角落。这所学校还有一项“荣誉制度”的传统:老师在考试中并不监考;如果有人企图作弊而被我们逮个正着,我们就会把他驱逐出校。我们根据一种复杂的,但却人人平等的制度分派工作。我们本来想与附近一所大都是女孩的农业学校联手,共同在沙漠中建立一座新的集体农场。不过,我们最后却进入瑞维维姆集体农场。这一座已设计完成的集体农场远在沙漠之中,当时才刚刚成功地设置一条管线,使加利利海的鲜水可以引流到纳格夫——干旱的南方。这个集体农场为了让水能为工业所用,因此需要专业的农夫,我们学校大约有12个人加入。

我在服完兵役之后,随即加入。我们在沙漠中栽种一些从来不见于当地的果树:桃、梨、杏、葡萄,后来还种鳄梨。我们运用邻近一座集体农场发明并制造的滴水系统,以节省水源。我们设计一种疏开桃树时可以节省人力的方法。我们还从美国的佛罗里达州及加州走私一些新种果树。我全神贯注在我的各种活动里,完全认同正在进行的事:努力工作并期待一个较好、较美的未来。我完全抑制我家庭的过去及其悬而未决的两难状况和恐惧。

也许不能算是完全抑制,因为我不管到学校或集体农场,总随

身拖着一把大提琴。我设法继续学习并演练；这项消遣在当时所弥漫的拓荒精神里，虽然引起嘲弄，但却是我在意识上唯一能与父母的传统相互联结之处。然而，我在肉体和精神两方面，都离我父母和哥哥非常遥远。而我的恐惧已不复存在。至少，我并没有感受到恐惧，而且我当它已消失了似的。

到了6日战争(发生于1967年6月——译注)爆发时，我已结婚并育有一女一子。接着我被征入一个装甲师的探路部队，这个师一路打到苏伊士运河。其间我丧失一位好朋友，他在同一师的下级单位，我们两人曾在这之前的两年里共同培植我们的果树。这场战争虽在欢欣的凯旋声中结束，但是我却满怀恐惧地回来。那是我的第一次战斗经历，而且亲睹身边的人被杀死。在那些时刻，生与死纯粹凭借机运。虽然我四周的言论仍然理直气壮，但是我自己的护盾却从此开始出现裂痕。我想读书。我曾考虑读生物学或心理学，最后虽然选择后者，但并不完全了解何以如此(我们永远可以知其然，但这并不表示我们也知其所以然)。

我个人的全面危机出现在数年后，赎罪日战争(发生于1973年10月——译注)爆发之后。我还是在探路部队，这次是在叙利亚前线，我们试图解放叙利亚军队在此之前所占领的以色列据点。我记得我曾看到几名年轻俊美的士兵死在壕沟里，也记得极度震惊地把一些士兵拉出地堡。这一次真的是吃苦受难。当我在六个月的军旅之后回到家时，整个人变了个样。我无法适应规律的集体农场生活。我无法与人谈论我的战争经历。虽然我被选为集体农场的秘书而且应该设法助人，但是，真正能让我继续度日的，却是我的子女和我极力想完成的硕士学位。在那艰难的几年之间，处处是恐惧。

我的家庭生活跟着瓦解。于是我进入陆军呆了一年，担任战地心理学家并开始接受心理治疗。这年年底，我父母病了，我哥哥和我就照顾他们。这是我头一次经历人生的那个转折点——父母

无法再照顾你而你必须开始照顾他们。我父母从1957年开始接受德国的赔偿,自此以后,每年夏天他们都会前往瑞士的则马特。他们不喜欢在德国旅游,但是在以色列正当炎夏之际,瑞士的阿尔卑斯山令他们既清爽又轻松。也许那是他们“归根”幻想的实现。那年夏天,由于我们觉得他们无法独力旅行,因此决定由我和我女儿同行。

我们搭乘一艘豪华的邮轮前往欧洲。我母亲在整个航程中一直极度沮丧;然而,在我们抵达日内瓦的那天晚上,当我父亲和女儿都上床之后,她要我陪她沿着湖边散步。就好像看到花朵在我眼前绽放似的:优雅的瑞士商店,照亮湖边的老房子,欧洲语言的声音——我母亲突然之间又充满了生命力。直到那个时候,我才完全领会她那几年在以色列过日子是怎么个样子——欧洲是她的家园,而她随时都热心地等待下一次的欧游。

我们一起度过两个星期,那对我并不容易。我突然觉得我的某部分感受到我母亲所感受的。特别是我们在树林里漫步时,我更有这种体会。见识到那些树林、树林的气味和成份时,我有一种最奇怪的感觉;这些东西我在以前虽然一无所知,但并不觉得陌生。

那时候我仍然在接受心理治疗,仍然颇受恐惧的支配,但是,渐渐地,希望回来了。我再婚,并且在父亲过世不久就添了个儿子。父亲在某一年夏天的瑞士之旅中因二度心脏病发作而去世。在他逝世之前的两年里,我们曾有几愉快的交谈,我们的谈话打破他常有的沉默。我体验到我已继承了父母亲对他们家乡文化的渴望(父亲闭口不谈,母亲却明示这种渴望),那种文化早就骤然被截断。我从反复的试验中得知,分离是涉及许多个离去与归来的一种过程。我开始在欧洲扩展专业领域上的接触,并且开始定期地前往那里。1985年,我在德国着手进行一项研究计划:访问犹太大屠杀纳粹执行者的子女(巴旺[D. Bar-On],1989)。

在某次研究旅行期间,我母亲和我约好在汉堡碰面并带我去看她的“家乡”。我们花了两天的时间沿着几条运河散步,我们家族有一百多位成员曾在这些运河的所在区域住过。她用一种她论人时所用的讥刺性幽默,不断地述说多位成员的故事。但是,这对她也是很痛苦的。没有一扇门可以让她敲了之后说“嗨,我回来了”,只留下对如烟往事的回忆。1992年,我母亲以85岁之龄逝世于海法。我在医院陪她度过她生命的最后一个星期。她用英语(生气时就用此种语言)、希伯来语和德语混着说话。我要安慰她时,就跟她说德语。她去世之后,我就动身前往特拉维夫孩子的住处。临行前当我锁上她的公寓房子时,我用泪眼看了那些空房间最后一眼。我觉得我是在为一个永远不复返的年代关门。

70年代中期,我开始在我们那个地区的集体农场诊所当心理治疗师,当时的第一位病人是个具有深棕色美目的13岁男孩,他坐在椅子上,一言不发。我不知道做些什么,于是提议一起散步。我跟我的小儿子就是这么做的:我边走边说话,就像多年前我与我祖父的交谈一样。这个男孩,尼泰,因为父母亲不久前的离婚而感到烦恼。我们有数度美好的散步与谈话,他的情况“有所改善”,因此我和他的老师都认为他不需要进一步的治疗。

数年之后,他的弟弟艾隆也被送到我这里。他在学校、在家里都难以管束,而他母亲也很担心他的“情况”。然而,在我跟他谈过两次之后,我觉得他不过是个典型的青少年。由于他母亲德芙拉仍然担心,我就建议她来接受精神治疗(也许早在大男孩来找我时,我就该这么做)。到那时候,我才知道她原来是个犹太大屠杀的生还儿童。她在5岁时,就与母亲和哥哥躲到沦陷的法国南方。在德军占领后不久,当他们还在巴黎时,她父亲“消失”了。

在治疗期间,德芙拉才首次试图澄清她父亲到底在何时被带到奥斯维辛并死于毒气。她父亲和母亲是在战争爆发之前不久离

婚的。如此说来,德芙拉小时候曾两度“失去”父亲,先是在离婚,然后又在大屠杀时。初到以色列时,她与一群幸存的法国儿童住在一处以色列集体农场里,在那几年之间,她曾企图自杀,并在第二次自杀未遂之后不久,被送进医院,但是在医院作心理治疗期间,她几乎不曾提到犹太大屠杀的事。她的母亲和哥哥当时仍住在巴黎,她也偶尔去看他们,但是她与他们,尤其与她母亲,并没有维持良好的关系。

我自问,德芙拉在那些年里——身兼少妇、妻子(至少有那么几年)、母亲、地方上很有能力的化学家、女儿和妹妹,而且从未反省那个过去,以及那个过去与眼前的情感和行为之间的关联——如何设法让自己的创伤经验“正常化”,并在一个非常苛求的社会里(尤其是在集体农场那种气氛里)走出自己的路?我请她就记忆所及,告诉我她小时候避难以及后来初到集体农场那几年的经历。在两年半的时间里,我们每个星期都会碰面。我们之间的对话非常不寻常,是我从未经历过的一种对话。她总是努力在找出一个可以谈论许多议题的方式,而我则在寻找一个在我自己的参考体系内可以了解她的说话内容的方式。我必须依赖她的思路和反应,从而引导她把那些反应化为明确的叙述。

在初期的某一次会面中,德芙拉告诉我一个她所做的梦:梦中,她是个4岁的小孩,穿着一件绣花的白衣,正在听她父亲弹钢琴(他真的会弹琴)。突然之间,德国兵破门而入,抓走她父亲,把她一个人留在那里。德芙拉此时认为她的悲痛与这个梦有关。她想念她父亲,他是她孩提时非常喜爱的人,她希望他有一天会回来,而且她从不放弃这个希望。此时的她充满恐惧,而且仍然对母亲和哥哥深怀内疚(在避难期间他们曾打她,因为她是个调皮且不体谅的女孩,而她不小心的举动可能会暴露他们的藏匿地点)。

一年之后,德芙拉又做了同样的梦。然而,这一次,她是从她父亲的观点看到相同的事件——他弹琴取乐,而小女儿就坐在身

边。我注意到这个梦的第二种说法与她当时的状况有某种关系。她当时的状况正稳定地在改善。她比较不那么担心她的儿子们，而他们也自在成长。过了不久，我们决定结束治疗。

然而，数个月之后，德芙拉又回来了：她第三度做这个梦。这一次，她自己是来带走她父亲的德国士兵之一。依她的看法，这是她头一次能自觉地对父亲生气，那个离婚时“离她而去”的父亲，依据她所说的，她想“在梦中杀死他”。

除此之外，她觉得很好，已决定前往集体农场去追求自己的职业生涯。数天之后，她打电话给我，说她刚记起她与父亲的最后一面：他来到母亲的住家，但是由于父母之间的紧张关系，他没再说再见就匆匆离去。通电话之后几个月，德芙拉又来了，既颤抖又挥泪：她哥哥在毫无先兆的情况下自杀了。在她看来，他一直是理性、沉着型的人。他的妻子和两个孩子完全不知所措。德芙拉本人虽然因他的死而很难度日，但是却能应付有余——她说，这都是由于她在我们的会面当中有所领悟所致。

如今，我不时遇见德芙拉，因为我们住在同一个镇上。她那个梦已不再出现。我把她那三个梦收录在《沉默的遗产》(1989年)一书里，出版之前，我把文章拿给她看，她回我一个微笑，用那一口仍然稍带法语腔的希伯来语说：“丹，事情全不是那么一回事的。”我为德芙拉做心理治疗的经验，促使我开始了解一个人要在过去与现在，恐惧与希望之间找出一条路，是何等困难，尤其这个过去如果还包括痛苦的事件或事实时——这些事件或事实虽然永远无法彻底被验证，但却已永远改变一个人对世间仁义的基本信念以及处事的价值观(雅诺夫布尔曼[R. Janoff - Bulman], 1992)——这条路更难找。一个人在日日夜夜仍受迫于这种心灵创伤之下，如何独力扶养孩子呢？德芙拉虽然已经尽力而为，但是我们没有理由期待她能完全靠自己的力量去处理此事。一旦她的孩子开始出现问题，她就需要帮助，以区分她自己的问题和孩子们的问题。她

需要再恢复信心,再度相信即使她自己的生活已经被生活历史中极端艰难而且在某种程度上已属“反常”的情况所扭曲(费尔曼[S. Felman],1992),但是她依然可以为她自己和她的孩子建立一种正常的生活。我自问,“其他具有类似的生活历史,而且还没有一套验证方法的人,他们如何处理他们的生活(及生活的故事)呢?”

德芙拉那个一再出现的梦促使我在聆听别人的生活故事时,更仔细地检验“什么是事实?”这个问题。一个事件当然都有一个“历史性的”事实(已发生的事),但是还有若干个“叙述性的”事实(一个人述说已发生之事的方式)(司本斯[D. P. Spence],1980)。随着德芙拉那个梦而产生的各种叙述性事实,可能都关乎她在梦境出现当时的生活实况。当她不再做这个梦时,是否因为“正确的解答”——某一个特殊的记忆——已然浮现?弗里兰德(Sh. Friedlander,1980)引用马里内克(Marinek)的话,“有所认知之后,记忆就随之而来”。将来我们是否“知道”曾经有一个“解答”呢?最后,还有一项后续的证据,那就是数年之后,德芙拉笑着说,“事情全不是那么一回事的”。她是什么意思?她为什么笑呢?

这些问题的答案在我们聆听大屠杀生还者的故事时,变得更为复杂。一方面,我们觉得我们没有领会某种东西:事实上,我们没经历过他们的经历。另一方面,他们也觉得某种东西遗漏了:很难用日常言语描述发生在他们身上的事。思想和语言的实际结构非常脆弱,如果我们试图在记忆和感觉,以及目前的现状(包括听者的在场)之间——其间的矛盾常常不只是一方面——搭起一座桥梁,那些结构可以轻易就瓦解。他们怎么能把自己恐怖的经验“翻译”成普通的话呢?没经历过那些事的人,又能从这些叙述里找出什么意义呢?他们把这种叙述中的哪部分——如果有的话——延递给下一代呢?他们因为有了新的生活经验而得以修通什么呢?

我在班古里昂大学所教的一门课是“犹太大屠杀在社会心理上对后代所造成的后作用”。在课程之初,我都要学生先去采访一位大屠杀生还者的生平,然后写下来并带到课堂上。在某一个学期里,艾拉带来她祖父的故事,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前不久,就已是波兰的医师。当德军直驱他的镇内并围捕犹太人时,他和妻子就把刚生下的女儿交给他以前的一位非犹太病人,自己则躲到游击队里。他担任游击队的医生,直到战争结束。在他们回家之后,那位非犹太妇女不愿交还他们的女儿。他们不得不上法庭解决。这个孩子就是艾拉的母亲。

在这门课的第二学期刚开始时,我会要求学生去访问大屠杀生还者的子女。艾拉决定访问她母亲。最后,在课程快结束,而学生也必须完成一项独立的研究计划时,她和一位同学访问了整个家庭:她母亲的三位手足,她自己的弟弟(16岁),以及每一位阿姨和舅舅的长子或长女。这在她来说,不论是访问内容或针对内容的分析,都是惊人的成就。艾拉和她同学呈现出她祖父的子孙们述说家庭历史的各种方式,有的强调过去的英勇面,有的则着重较痛苦的部分,但是每一个人都从自己现在的观点讲话。

艾拉的访问内容激发一个更大的计划:访问大屠杀生还者的家族并与每个家族的三代谈话。若干年前,我的一群学生曾运用罗森塔(Gabriele Rosenthal)所教的一门课的架构,进行这项研究。那门课专门处理传记与叙述的分析。在针对大屠杀执行者的子女做研究的期间,我就已在德国与罗森朵碰过面。我在那里所见过的非犹太人之中,只有少数人马上就了解我正试图寻找的东西,她就是其中的一位。当时她已发现了一套方法,用以分析她的研究对象;这套方法我虽不熟悉,但我随即认为非常适用于我的学生极欲了解的复杂议题。我们的合作关系就这样开始。她来到以色列,在我那所大学的行为科学系教授叙述与传记的分析,并在1989至1991年期间以及1993年,对说德语的大屠杀生还者进行

访问。

我那门课衍生出一项集体项目,而此书就是这项工作的成果。诺嘉吉拉德(Noga Gil'ad),茱莉夏汀(Julie Chaitin),波丝玛德维莫卡(Bosmat Dvir-Malka),和艾那怀思(Einat Weiss)全程参与这项计划。在访问及初步分析方面,娥玛莉亚盖恩(Amaliya Gaon),黛娜瓦第(Dina Vardi),多娃米罗(Tova Milo),和雅德娜李怀(Yardena Levi)也加入我们。我要感谢这些人的协助、好奇心、启发及助益良多的意见。我还想向罗森朵教授致谢,她鼓励我们做下去,并在我们艰难的旅途中一路陪伴我们。蜜莉安凯伦(Miriam Keren)盛情可感,只要我们需要从德文翻译什么,她就随时自愿付出时间。

有些读者也慷慨提供意见和想法。我特别要感谢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的利布利克教授(Amiya Lieblich)和洛何美贺盖托(这个集体农场位于以色列西北亚克港以北4公里处,是二次大战期间欧洲犹太社区暴动的生还者在1949年建立的——译注)“犹太社区战士博物馆”的兹维德若先生(Zvi Dror)。在编辑阶段,班古里昂大学行为科学系的雅奈博士(Nitza Yanai)曾提供无可取代的意见和建议。后来,麦克林医院的阿尔贝克医师(Joseph Albeck),哈佛大学的西蒙教授(Bennett Simon),以及康乃尔大学的佛斯特教授(John Foster)也对本书的初期版本提出深知卓见,是我们在修订上的一大助力。此外,我还要感谢以德基金会(GIF),特别是会长巴拉克(Amnon Barak)博士,他们提供研究资金,使我们得以进行访问并处理内容。我也要感谢来自乌林集体农场的茱莉夏汀,她为我们做出优美周到的英文翻译。最后,我要谢谢我小儿子哈隆和我妻子泰咪的耐心。我常常在他们的故事中缺席,因为我早就深深卷入别的家庭的故事。

在我们的讨论即将开始之际,不能不提到撰写本书的那段期间:波斯湾战争。记得有一天,我正设法专心去做某一篇访问的分析,但却始终无法从脑海驱除前一天晚上我那9岁儿子的形象:我